

# 印尼非暴力运动的发展及其特征

张 洁\*

**【内容提要】** 非暴力运动在印尼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这突出表现在苏哈托下台及威权政治结束的历史性转折过程之中。本文认为,学生组织是非暴力运动的激进力量和主要参与者,他们发动的民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直接影响了反对党和伊斯兰教组织中的反对派政治精英的立场,加速了苏哈托政权内部的分崩离析和苏哈托的下台。但是,印尼的非暴力运动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反对力量发展缓慢,在斗争目标和策略上较为保守,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反政府联盟。这就决定了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民主化将是通过合法途径逐步改革的长期渐进过程。

**【关键词】** 印尼 非暴力运动

非暴力运动是指某些政治力量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发动民众进行游行示威的活动。这是一种通过和平方式达成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具体方式包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游行集会、举办街头讨论会或组织辩论演讲、发起街头签名运动、罢工罢课、静坐绝食、占领广场、围困政府机关等。运动的参与者通常包括反对党、宗教团体、学生组织、非政府组织、普通民众等。在苏哈托的威权统治时期,由于政府的高压统治,非暴力运动成为许多反对力量参与政治的途径之一,也成为印尼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

## 印尼威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在苏加诺的“有领导的民主”时期结束后,印尼经历了长期的威权统治。苏哈托政

府建立了以军队为政权基础的一党专政,严密控制国内政治生活,压制其他政治力量的发展,印尼民主力量的政治参与途径因此而大为减少。不过,苏哈托政权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使其执政地位长期相对稳固。

### (一) 威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1965年苏哈托上台后,于次年宣布印尼进入“新秩序”时期。所谓“新秩序”,实质是建立完全的军人统治,依靠武装部队控制国家。其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实行总统一专业集团—军队三位一体式的统治体制<sup>①</sup>。“专业集团”长期一党执政;军队则具有“双重

\*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得到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和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亚洲研究所(Monash Asia Institute, Monash University)的资助与支持,特此感谢。

<sup>①</sup> 贺圣达:《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 1945~1994》,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职能”，既是军事力量，也是社会政治力量，现役、退役军官在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以及国家各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主要位置。这就有效地确保了苏哈托个人的长期执政。

同时，苏哈托严格控制其他政治势力的发展。通过“简化政党”，将印尼原有的多个政党合并为“建设团结党”和“印尼民主党”，与由苏哈托组建的、代表军方利益的“专业集团”共同构成印尼的多党制。其中，建设团结党(Partai Persatuan Pembangunan)于1973年1月由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印尼穆斯林党、印尼伊斯兰教师联盟党和白尔蒂伊斯兰教党合并组成，80年代后伊斯兰教士联合会退出。印尼民主党(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于1973年1月由印尼民族党、基督教党、天主教党、印尼独立拥护者联盟和平民党合并组成。不过，“专业集团”通过对国会的控制，在各次选举中长期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拥有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

苏哈托政府在执政初期强调经济建设是首要任务，高度的中央集权是为了确保政治稳定，为全面进行经济建设创造条件。苏哈托政府重视经济发展，依靠专家治国，实施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推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实现了印尼经济迅速、全面的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成功则使苏哈托的执政更加“合法化”。

(二) 苏哈托统治的“苏丹化”和腐败的日益严重

苏哈托执政后期，印尼的威权政治逐步蜕化为“苏丹式政权”。马克斯·韦伯曾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将“苏丹式政权”视为世袭家长专制政权(Patrimonialism)的极端类型。在这种政体下，当权者甚至可以在完全不受传统习俗与惯例约束的情况下行使权力。美国学者林兹(Luan Linz)在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韦伯提出的“苏丹式政权”

概念，用以指称那种任意使用权力、退化了的家长制权威类型——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cronyism)的关系网和渗透于官僚各层面的腐败甚至成为政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权力范围的私产化、统治方式的非意识形态化以及以庇护制网络为基础都是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林兹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政权是从威权主义政体、传统君主政体、民主政体或全能政体等规范类型中逐渐蜕变形成<sup>①</sup>。

随着苏哈托的长期执政，其政权的“苏丹化”日益明显。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苏哈托在“新秩序”体制内的个人影响力开始不断增强。与此同时，苏哈托家族成员的腐败丑闻也不断出现。到80年代中后期，苏哈托政权的家族化、亲信化趋势不断加强，苏哈托开始从完全依靠军队逐步转向倚重自己的亲信朋党和文官政客，苏哈托家族的权力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也不断扩张。此外，苏哈托对政权的控制更加严厉，对内部和外部的不同意见的容忍度不断降低<sup>②</sup>。由此，以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和裙带关系(corruption, collusion and nepotism)为特征的政治问题在印尼日益严重。

腐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削弱了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并激化了社会矛盾。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反对腐败就成为印尼非暴力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而苏哈托政权的“苏丹化”则进一步压缩和阻碍了社会各阶层参与政治的途径，迫使各种反对力量不得不以非暴力运动作为政治斗争方式之一。

<sup>①</sup> 参见萧功秦：《从新制度主义看发展中国家的腐败与苏丹化现象》，中评网，2005年10月1日。<http://new.china-review.com>

<sup>②</sup> Edward Aspinall, *Opposing Suharto: Compromise, Resistance, and Regime Change in Indone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03-208.

## 印尼主要的反对力量及其特征

印尼的主要反对力量包括反对党、伊斯兰教组织、学生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由于苏哈托政府对国内政治生活的严格控制,印尼反对力量发展缓慢,直到90年代,其组织及其参与的非暴力运动才逐渐增加。

### (一) 反对党: 建设团结党和印尼民主党

虽然印尼实行多党民主制,但是由于苏哈托政府对政党的严格控制,作为反对党的建设团结党和民主党不过是对政府和总统的领导表示拥护的工具,政治影响力有限,因此被冠以“半反对党”(semi opposition)的标签<sup>①</sup>。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设团结党还具有较大的影响力,1977年的立法选举中曾经获得27%的选票。但到80年代,由于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退出,其影响力迅速降低。

印尼民主党的前身是印尼民族党,与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党合并后,政党长期处于内部的权力斗争,加之苏哈托政府的干涉和控制,影响力较小。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印尼民主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93年,梅加瓦蒂当选为党主席,被认为是第一个通过民众支持而获得党内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从此成为反对苏哈托政权的重要旗帜<sup>②</sup>。1996年,梅加瓦蒂领导印尼民主党在人民协商会议中获胜,但是,由于苏哈托政府和军队的干预,她被解除了民主党总主席的职务。这引起了其支持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印尼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与治安部队发生了冲突,造成印尼近20年期间最激烈的骚乱<sup>③</sup>。梅加瓦蒂也因此成为印尼政治精英中反苏哈托的代表人物。

### (二) 伊斯兰教组织

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 NU)和穆罕默迪亚协会(Muhammadiyah)是印尼主要的两个伊斯兰教团体,在穆斯林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印尼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成立于1926年12月,拥有4000万会员,主要活动基地在东爪哇和中爪哇,代表着广大农村的伊斯兰教势力。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曾在1973年至1984年作为建设团结党的成员,1984年瓦希德任主席后,该组织退出政治舞台,转变为以发展福利和教育事业为宗旨的宗教群众组织,致力于发展伊斯兰经文学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宗教人才和专业人士,许多人在政府机关工作,在印尼的政治、文化、宗教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穆罕默迪亚协会成立于1912年,拥有3000万会员,代表的是城市穆斯林中产阶级。通过开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穆罕默迪亚协会在政界、商界、教育文化界以及军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市民社会也拥有广泛的政治根基<sup>④</sup>。

比较而言,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领导人瓦希德倾向于和平的政治改革,面对印尼的非暴力运动,与苏哈托政权采取合作态度,支持和敦促苏哈托通过改革逐步实现民主化。穆罕默迪亚协会的主要领导人赖斯<sup>⑤</sup>则相对比较激进,早在1993年就对总统继承人问题

<sup>①</sup> Edward Aspinall, *Opposing Suharto: Compromise, Resistance, and Regime Change in Indonesia*, p. 209.

<sup>②</sup> See E. Aspinall, H. Feith and G. Klinken, eds., *The Last Days of President Suharto*, Monash Asia Institute, 1999, p. iii.

<sup>③</sup> Edward Aspinall, *Opposing Suharto: Compromise, Resistance, and Regime Change in Indonesia*, p. 185.

<sup>④</sup> 许利平:《印尼和马来西亚民主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因素》,载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3~84页。

<sup>⑤</sup> 1985年加入穆罕默德协会,1995~2000年间担任组织内主要领导人。

表示质疑,这在当时相当少见。90年代中期,由于印尼政治和经济发展缓慢,他又进一步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这使其成为苏哈托政权的对手,同时也成为伊斯兰教组织激进力量的代表人物。

由于这两大伊斯兰教组织无论是在中产阶级还是在广大民众中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其对非暴力运动的态度十分重要。但是,由于瓦希德领导下的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始终倾向于与苏哈托政府合作,在体制内部进行改革。所以,伊斯兰教组织并未形成统一的反政府力量,也未能积极参与非暴力运动。

### (三) 学生组织

非暴力运动是学生组织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学生组织是印尼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诸如20世纪初的反殖运动、40年代的独立运动以及60年代中期的政权更迭等。70年代初,新一轮的学生运动出现,相继发动了多次示威游行活动,表示对腐败问题和1971年总统选举的不满,呼吁政府进行改革。不过,此次学生运动相对较为温和,自称是道德力量(Moral Force),强调其代表的是对政府的批评性支持力量,旨在更正和提醒政府的错误行为,而不是推翻政府。

苏哈托政府在执政初期还愿意和学生进行对话,但是在1974年的学生运动后<sup>①</sup>,其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77~1978年间,苏哈托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协调学生事务、校园生活及团体正常化”的政策条令(Normalization of Campus Life / Bodies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Student Affairs)。原有由学生直接选举产生主席的学生组织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由高校管理委员会任命主席的学生团体;学生刊物被禁止发行;学生不再允许进行校园政治活动;等等。随着政策的变化,到70年代后期,学生组织开始明确提出反苏哈

托、反政府和反军队的口号。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学生运动还没有完全和新秩序政权决裂,他们只是对体制的领导人不满,但是仍然对体制的核心意识形态思想表示效忠<sup>②</sup>。

80年代初期,学生运动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形式较为松散的学生团体,定期就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讨论,有些还出版刊物,但总的来看都是非正式的。其次,一些学生刊物得以恢复,这些刊物的办公机构逐渐演变成了非正式的活动中心,在之后的非暴力活动中成为重要的领导和协调机构。再次,学生开始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成为非政府组织的自愿者和招募者。通过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学生进行社会调查,逐步建立起与贫民团体的联系。到80年代中后期,上述这些松散的活动逐渐相互联系,形成了网络。

1988年10月,日惹、万隆和雅加达等地区的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要求获得校园自治的权力。对此,有学者指出,该事件标志着学生运动在印尼的重生<sup>③</sup>。因为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不再只集中于大城市的高等院校,而是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开始参加;有更多来自中下层的学生参加,使得学生运动更为激进;等等。

此后,学生组织围绕人权和政治改革等问题,不断将新发生的各类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与他们的政治主张相联系,开设政治论

<sup>①</sup> 1974年1月日本首相访问印尼期间,印尼学生上街示威抗议日货对于印尼民族工业的冲击,结果引起军民冲突,造成11人死亡、177人重伤、120人轻伤、775人被扣留,144间建筑物被破坏和烧毁。

<sup>②</sup> Max Lane, "Openness", *Political Discontent, and Succession in Indonesia: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1989-90*, Griffith University, 1991, pp. 3-4.

<sup>③</sup> Edward Aspinall, *Opposing Suharto: Compromise, Resistance, and Regime Change in Indonesia*, p. 117.

坛,加强与政治精英的联系,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政治。他们在少数精英分子的政治异议和广大民众的不满情绪之间建立了桥梁,推动了印尼民主运动的发展。

#### (四) 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从20世纪70年代主要以雅加达为基地的几百个发展到80年代的3000多个,到90年代末更是激增至8000多个。在性质方面,从自助型社团组织(self-reliant community institutions)发展成为有重要国际关系的成熟的辩护型非政府组织。在活动内容方面,从最初致力于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援助、扶助贫困、教育普及、社区建设等内容的中小型社会发展项目逐步转向参与政治,试图借此影响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由于他们进行了很多的社会发展项目,因而建立了与广大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联系,具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动员能力。

从80年代开始,部分前学生领袖加入了非政府组织,在一些地方性或是小型的非政府组织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作为新一代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试图改变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方向,更加着力通过把非政府组织建设成印尼政治格局中新的政治支柱<sup>①</sup>。此外,许多非政府组织与学生激进分子建立协作,组织和赞助有关政治改革、人权、经济改革、净化政府、民主、正义等主题的公开论坛。从90年代开始,这些新的非政府组织号召民众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政策,日益成为推动印尼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此外,媒体、知识分子等中产阶级也越来越多地以非暴力运动作为各自政治诉求的重要途径。1994年,苏哈托政府查封了印尼三家重要的刊物 *Editor*、*Tempo* 和 *Detik*, 引发了中产阶级的广泛不满,记者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联盟,撰写了大量文章抨击政府。媒

体对于学生组织的游行活动报以支持和同情的态度,给予了更多的报道。报纸刊物、电视新闻,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不仅使得苏哈托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社会舆论,而且成为反对力量的重要阵地,以及宣传民主观念和动员民众参政的新途径。

总之,各种反对力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印尼的非暴力运动,有的呼吁苏哈托政府进行改革,有的则明确提出反苏哈托政府、反对军队的政治口号,但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联盟,也缺少领袖人物。因此,长期以来,印尼的非暴力运动并没有对苏哈托政权构成实质性挑战,直到1997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以及长期的政治高压终于推动各种反对力量加入印尼的非暴力运动,迫使苏哈托结束了在印尼长达30多年的威权统治。

### 1998年的非暴力运动高潮 与苏哈托下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苏哈托政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经济恶化直接导致失业率增加、物价上涨、银行破产和生活水平倒退,这不仅影响了平民的生活,而且也使中产阶级深受其苦,全社会对苏哈托政权的不满情绪激增,对政府的批评声音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1997年12月,学生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城市平民开始示威游行,直接抨击政府的腐败问题,要求苏哈托下台,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党和伊斯兰教组织则建议苏哈托政府加快改革的步伐。

然而,这一时期的苏哈托政权内部还是相对稳定。各派系仍然效忠苏哈托,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对后苏哈托时代的权力瓜分和争夺,而不是对苏哈托目前的统治地位进行挑

<sup>①</sup> ADB, *A Study of NGOs in Indonesia*, 1999. <http://www.tsunami+evaluation.org>

战,即使私下很多人认为应该进行改革,但也认为是苏哈托下台以后的事情。1998年,苏哈托再次顺利当选总统,而在其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则包括了其长女以及多名亲信朋党。这种违背民众改革要求的行为激起了规模更大的反政府运动。

促使非暴力运动升级和反对派精英抛弃苏哈托的两个关键性事件是5月4日政府宣布提高电力和食品物价的决定,以及5月12日特里萨克蒂(Trisakti)大学的学生枪杀事件。前者使民众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引起城市平民、失业工人等群体的强烈不满,促使他们走向街头;后者则使学生组织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冲出了校园。从5月19日起,学生们手持横幅、标语及印尼国旗,在雅加达的国会大楼进行示威静坐,他们高呼民主口号,表示除非苏哈托下台,否则不会撤走。同时,日惹、万隆等地的学生游行活动扩大到50多万人,并且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参加。

面对民众的强大压力,阿敏·赖斯和梅加瓦蒂等人亲自到特里萨克蒂大学悼念被害学生,称他们为“改革的英雄”。赖斯还公开呼吁苏哈托下台。同时,瓦希德等伊斯兰教领袖也联名发表声明,呼吁苏哈托为了从骚乱和分裂中拯救印尼国家和人民,应该考虑辞职<sup>①</sup>。不过,多数反对派精英的政治要求仍然比较温和,他们不愿意和苏哈托政府以及军队直接对抗,而是强调与政府的协商,希望进行和平的改革。虽然赖斯宣布成立“人民使命议会”(The People's Mandate Council),成员包括要求苏哈托下台的著名反对派人士,试图建立一个各派反对党领袖参加的联盟以取代苏哈托政权,但是梅加瓦蒂和瓦希德及其支持者却并未表示参加。

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也给苏哈托政权内部的政治精英带来了强大压力,迫使他们重

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是放弃对苏哈托的支持还是继续与民众抗衡。如果苏哈托最终辞职的话,那么及早地重新选择立场将直接关系到他们各自的政治前途。5月18日,长期忠于苏哈托的专业集团主席、国会议长哈尔莫科(Harmoko)首先公开呼吁苏哈托应该为国内的骚乱引咎辞职,20日又进一步宣布给苏哈托三天的时间,否则国会将启动对总统的弹劾程序。之后,14名内阁成员表示,如果苏哈托进行内阁重组的话,他们将不参加,这迫使苏哈托开始考虑辞职。以维兰托为代表的军队虽然表示效忠苏哈托,但是拒绝动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1998年5月21日,印尼总统苏哈托终于宣布辞职,结束了对印尼32年的独裁统治。

总体来看,学生组织是反苏哈托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力量,经济的恶化则促使广大民众参与到反政府的运动当中。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不仅促使反对派政治精英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而且也引发了苏哈托政权内部的分裂。相比而言,反对党、伊斯兰教组织的多数政治精英在关于印尼民主和改革的问题上,政治主张和参与程度都比较保守,并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组织能力,因而印尼的非暴力运动始终未能形成共同的联盟。

### 印尼非暴力运动的特征 及其经验教训

从发展进程来看,从印尼的反殖运动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印尼的独立运动和50年代的民主运动,非暴力运动都是印尼政治斗争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在苏哈托执政初期,由于反对力量薄弱,非暴力运动发展缓慢。直到90年代以后,随着学生组织和非政

<sup>①</sup> Kompas, May 17, 1998.

府组织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非暴力运动才重新成为重要的政治斗争方式。然而对于这一时期的反对党、伊斯兰教组织等政治精英而言,虽然合法的政治参与途径被苏哈托政权所操纵和控制,他们的政治声音微弱,但是他们仍然谋求在原有政治体制内,通过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挑战苏哈托的统治,而不是诉诸非暴力运动。虽然也有少数例外,但得不到多数派的支持。1996年,梅加瓦蒂利用原有的合法政治途径,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但是由于苏哈托和军队的干涉,最终被驱逐出民主党并失去了总统候选人资格,其通过合法的政治途径挑战苏哈托的努力失败。于是,梅加瓦蒂及其支持者转而采取政治演讲和抗议游行的方式。这虽然得到了学生组织的支持,但由于未能得到伊斯兰教组织和其他反对派政治精英的支持,这一时期印尼始终没有出现能与苏哈托政权抗衡的反对力量。1998年是印尼非暴力运动发展的高潮,但反对派政治精英的立场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仍是强调体制的改革而不是通过发动民众,利用示威游行等形式推翻苏哈托政权,虽然在运动的后期也出现了一些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呼声,但是仍然缺乏实际行动,没有进行社会动员。

从印尼各反对力量的特点来说,学生组织和部分非政府组织属于激进派,不仅明确提出推翻苏哈托统治、反对军队的政治口号,而且通过政治论坛、游行示威积极宣扬自己

的政治诉求,但却缺乏领袖人物,社会动员能力有限。

正是由于力量分散和主张不同,未能形成反对苏哈托政权的统一力量,从而限制了非暴力运动的规模及其在推动印尼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对此,有学者指出,印尼的民主运动在本质上是不成熟的,1998年的成功与其说是非暴力运动的产物,不如说是印尼经济危机的产物。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危机使苏哈托的“苏丹式”统治最终分崩离析,而军队的中立化则使苏哈托政权丧失了最后的支持者。

笔者认为,非暴力运动在印尼政治发展进程和民主运动中具有积极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其直接导致了苏哈托政权的结束,更重要的是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学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民主力量得到了锻炼,民主思想得到了传播,民众的民主参与意识也有所加强。这对于印尼长期的民主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印尼的非暴力运动本身也具有一定局限性,尤其是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发展程度较低,影响力也比较小。从后苏哈托时期印尼的民主化进程来看,主要的政治力量仍然是苏哈托时期的专业集团以及反对党和伊斯兰教组织的政治精英,更多的是通过制度变革,实行多党制、总统直选、军队的非政治化、非中央集权化等措施逐步完成印尼的民主化,而不是诉诸于非暴力运动。